2015 年第 2 期
（第 14 卷）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家户制、村落保护主义与农业现代化发展

申　云[1]，朱述斌[2]

（1. 重庆大学 人文学部，重庆 400044；2. 江西农业大学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　要： 家户制因素和村落保护主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研究表明：村庄内部亲缘关系越紧密、村组间保护主义现象越弱、外地户口农户租入农地越难以及上一年非农户口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农地流转率的提高；村组内集体互助合作越差和上一年村组农业生产总值越高，越有利于机械化普及率的提高；其他村庄人员落户本村越困难、本村农户对外地机械进入本村组耕种越抵制、上一年村组农业生产总值越高以及上一年非农户口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农用机械总动力的提升；村庄内部亲缘关系越紧密和上一年非农户口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合作化率的提高。此外，家户制变量、村落保护主义变量以及社会经济变量对农业信息化率的提高没有显著性影响。

关键词： 家户制；村落保护主义；农业现代化；小农经济

中图分类号： F3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15)02－0001－08

一、引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国小农”的社会，并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特有的“中国特性”，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家户制[1]103。家户制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相对性和模糊性的概念，家户制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支配着农业的发展[2]，由其所形成的农业生产观念、组织形式等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在注重“创新制”的同时，汲取“传统制”的精华对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

国外对家户制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家户收入及家户脆弱性方面。Lokshin 和 Ravallion[3] 通过比较俄罗斯和匈牙利两国转型时期的家户收入表明，一般家户相比贫困家户更能从危机的冲击中得到恢复。Zhang 和 Wan[4] 使用群分析方法分析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会改善家户福利的脆弱性，“跨越”式的技术引致则有利于突破家户人力资本的不足。Gerry 和 Li[5] 对俄罗斯家户群体分析发现，以家户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是促进平滑消费的重要机制。Ivanic，Martin 和 Zaman[6] 认为家户的脆弱性在短期内会受到较高食品价格的严重冲击，但在长期这种不利影响要小得多。另外，Suryahadi 和 Sumarto[7] 发现经济危机和家户遇到意想不到的遭遇等负向冲击会使非贫困群体变成贫困群体，或者那些已经贫困的家户陷入持续性的贫困中。总体而言，家户制的概念在国外研究文献中显得比较模糊。

在国内，家户制与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相伴而生[1]103－109，然而研究家户制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现有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1)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现代化方面，梅方权[8] 认为以农民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需要加强对农业信息化的利用，从而更好地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咸春龙[9] 则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解放了农村生产

收稿日期： 2014－12－16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15.02.00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63025；71203236)；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YBJJ031)

作者简介： 申　云(1986—)，男，江西吉安人，重庆大学人文学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E-mail：1304643159@qq.com

力,但也面临农业产业化和组织化滞后的问题;薛琳琳[10]提出以家户制为主的农户经济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2)在家户制与新农村建设方面,张良[11]从农村文化建设的三维视角分析发现,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集合传统文化(包括家户制文化、信仰文化)、实体性文化及规范性文化的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建设好新农村;詹成付等[12]认为要推进乡村现代化建设,以村级产业发展为支点将有利于重塑村户制连接;陶自祥[13]认为农村家户文化延续方面的差异也会影响到乡村文化建设,这种差异导致不同地区文化发展存在异质性;姬会然[14]认为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应正确看待家户制传统和习惯性的文化形态,如宗族意识、家族观念等。(3)在家户制与农业产业化发展方面,潘锦云等[15]提倡以家户为主,农工商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路径[15],但这种农业产业化发展还需要考虑城镇化空间外溢所带来的影响[16];屈学书[17]提出农业产业化发展应坚持以家户经营为主体,加强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和法人化的发展路径探索,而家庭农场是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的有效创新。

综观现有文献,大多数学者对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研究相对宏观和宽泛,特别是把家户制与农业现代化两者进行结合的理论与实证探索极少,缺乏从本源性的视角来剖析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此,本文以家户制为视角,选取江西万安县黄南村作为案例,通过 Probit 模型,分析家户制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试图探寻影响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本源性障碍因素。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假说

(一)概念界定

家户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以强大的习俗为支撑构成的完整家庭制度;二是以强大的国家行政为支撑构成的完整户籍制度[1]108。家庭制度和户籍制度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础性和本源性制度,这两者相辅相成,形成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家户制。家户制本身既有一定的优越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家户集聚力量如果用于促进村落团结,促进经济发展,则有助于村落互助合作关系融洽,邻里乡亲关系和谐。但是,这种集聚力量也可能被用于保护自身利益,抵制外部竞争,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不利,此时本文将其界定为村落保护主义。村落保护主义是不同村落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或市场壁垒。

(二)理论假说

(1)农业的现代化首先需要农业的市场化,农业在生产经营和社会分工过程中,传统的农业生产环节也开始出现了专业化的分工,而这些专业化分工都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规模经营。农业规模经营一方面可以通过农地流转来实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生产环节的外包来实现[18]。农地流转率是反映农业现代化规模经营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村组内部是否存在亲缘关系或者是否流转给本村组人员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农地流转率。同时,村组内部农户也可能会存在较为严重的排外思想,比如有些农户认为把农地流转给外地人后会失去土地的安全感,不够放心,往往会强化村组内部人员之间的流转。同时,村组之间也可能会存在较强的利益竞争关系,比如某些村组为了发展集体经济,引进外地农业企业承包当地农地发展经济,但村组内部之间却由于多种原因会阻扰农地的整体承租,村组内部形成反对承租的合力,像一堵无形的墙阻碍农地的外部流转从而无法形成规模经济。然而,如果是该村组农户创办的企业,这种村落保护主义抵制程度明显降低甚至不存在村组成员阻扰的情况。因此,村落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农地的外部流转从而影响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假说 1:在家族或村组内部之间较为容易实现农地的流转,但村组间存在村落保护主义时则不利于农地在村组外部的流转。

(2)一般而言,虽然城镇化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打破户籍制度的藩篱,但其他村庄人员

或者城镇户籍人员落户本村组还是存在较大的困难。因此,为避免农忙时期机械不够用,本村组农户会考虑自购农机具,从而提高机械普及率和机械总动力水平。村组内部是否有集体互助行为反映当地农户的互助合作融洽度,互助合作越融洽,往往机械的利用效率会增加(因为有机械的农户不仅为自家农地耕作,同时也会帮助本村组其他无机械农户耕作),继而降低农用机械的普及率和机械总动力水平。当外地机械进入本村耕种时,村组内部(特别是有机械的农户)往往容易产生较大的排外心理抵制其耕种,这种村落保护主义现象将使得对机械需求的增加,间接提高机械普及率和机械总动力水平。此外,上一年村组农业总产值越高,代表当地农业生产占村组整体经济比重也越大,农户越有可能购买机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从而增加农用机械总动力水平和提高机械的普及化率。

假说 2:村组外部人员落户本村越困难越有利于当地村组机械总动力的提升;村组内集体互助越融洽越不利于农用机械的普及;外地机械越容易进入本村组耕种,越有利于促进当地村组农用机械总动力的提升。

(3)这种以家族和亲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户制往往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关系,当村组内存在较强的亲缘或族缘关系时,彼此之间互帮互助相对更为容易,合作的概率也相对较高。这种融洽的合作关系往往限于家户制下的亲缘和族缘关系内部,超过该界限时则相对较弱。然而,当这种互助合作在村组内较为融洽时,间接的会使得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相对不强(因为不需要合作社的集体互助),从而不利于村庄组织化的推进。另外,村落保护主义带有很强烈的地方特性,它强调的是区域内部的利益最大化,在外来不利因素介入时,松散无序的村落组织会团结起来,反对外部势力的进入。

假说 3:村组内存在家族亲缘关系有利于农户间互帮互助,但会造成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减弱,进而不利于村组合作化和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村落保护主义往往导致在村组(一定区域)内部合作容易,而在村组外部合作相对困难。

(4)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推广普及,农业的信息化成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的信息化包括农业的生产信息化、销售的信息化、社会服务的信息化等等。在农村,农户之间的信息接收和利用比以前更加方便、容易,而且传播速度更快。比如农民对农产品、农药、种子、化肥等供求信息,农业、农村产业政策信息,农民之友信息等,一般不需要在乡镇信息公告栏或者去当地农技推广站直接获取,通过手机短信或者网络等方式就能得知。家户制下通过亲缘和族缘关系的农业信息沟通在信息化时代显得更加微弱。互联网覆盖率以及农民之间通过网络共享农业信息概率的提高也使村落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很难阻碍当地农业信息化的普及。

假说 4:家户制和村落保护主义对农业信息化率的提高不存在直接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模型设计及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为了更好地考察家户制、村落保护主义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我们进行了实地调研。课题组对江西省黄南村 18 个村民小组的全部农户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农户农业生产和基本生活情况。同时,通过该村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了解全村的总体概况。在实地调查中,重点访问了机耕手和帮助其他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人员。农户问卷在村民大会时集中发放,涉及个体的信息通过单独细致的访谈,相同的问题则通过大会表决来记录。其中,有部分外出务工村民未参加村民大会没有在统计范围之内。最后获得有效农户问卷 324 份,占总体农户数的 78%。

(二)变量说明与模型构建

1. 家户制变量

本文尝试通过虚拟指标来反映家户制情况。具体变量包括是否租入其他村庄农地、其他村庄

人员落户本村是否困难、村庄内部是否存在亲缘关系、是否有宗族信仰。这些变量主要用于考察农户的家户和家族观念。

2. 村落保护主义变量

本文通过构建虚拟变量来反映村落保护主义。村落保护主义变量包括村组内是否有集体互助行为、村组间是否有保护主义现象、外地机械进入本村组耕种是否有抵制心态、外地户口是否容易租入农地。村组内是否有集体互助行为可以反映该村的整体协调情况以及团结协作程度,以考察村庄内部的和谐状况;村组间是否有保护主义现象主要是间接反映村组之间是否存在利益纠葛而形成的抵制情绪;外村机械进入村组耕种是否存在抵抗心态主要反映农业的市场化程度和农业生产竞争情况;外地户口是否容易租入农地主要用于反映村组内部的排斥心态是否严重,对村组内部的农田是否愿意与外村组人员和企业共同经营的情况。

3. 社会经济变量

社会经济变量主要考察农业总体发展水平。包括上一年度的非农人口数、村组农业生产总值以及非农户口比例。

4. 农业现代化水平变量

根据相关研究,农业现代化水平包括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组织化和信息化等方面。本文用农地流转率来反映农业的规模化水平;用农用机械普及率和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水平来衡量机械化水平;用合作化率来反映农业组织化水平;用手机和网络宽带手段发布农业信息覆盖率来反映农业的信息化水平。农地流转率以流转农地占总农地的比重来衡量;农用机械普及率通过当地村组机械数量总和与当地农田总面积的比值来衡量,或称为田均机械数;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通过机械总动力与(总人口 - 外出务工人员人数)的比值来衡量;合作化率通过加入农业合作社人员占总户数的比例来反映;信息化率通过当地农村手机使用率或通讯网络覆盖率来衡量。

文中农地流转率、机械化率、合作化率以及信息化率通过采取与当地农业局统计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来处理。当调查实际值高于官方统计值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最后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现代化水平 = f(家户制因素;村落保护主义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其他因素;…)

其中现代化水平分别用农地流转率相对水平、机械化普及率相对水平、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相对水平、合作化率相对水平、信息化率相对水平来衡量。由于因变量为二元选择变量,于是选择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三)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 Eviews6.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影响农地流转率的因素主要有村庄内部是否存在亲缘关系、村组间是否有保护主义、外地户口是否容易租入农地以及上一年非农户口比例。村庄内部是否存在亲缘关系会在 1% 的显著水平正向影响农地流转率。农户在农地流转中,如果村庄内部存在亲缘关系,会优先得到农地的转让权,当农户外出务工时,其农地首先考虑是流转给有一定的亲缘关系或者关系要好的朋友,然后再考虑其他人。而当不存在这种亲缘关系时,有些农户为了图省事有时选择抛荒不种,不利于农地的有效流转。村组间是否有保护主义现象和外地户口是否容易租入农地都在 5% 的显著水平负向影响农地流转率,这与研究假设 1 基本相符。村落保护主义一方面保护了本村组的农业生产操作,另一方面也抵制了外来人员加入本村组的农业生产经营,降低了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竞争程度,即农业的市场化水平一定程度上受到村落保护主义的影响。外地户口是否容易租入农地在 5% 的显著水平负向影响当地农地流转率,说明农户之间还是更亲睐

于本地村民,认为本地村民更加值得信赖。上一年非农户口比例在 1% 的显著水平正向影响农地流转率,说明外出务工农户的增加导致务农人口的减少,为农地流转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农地流转率的提高。

影响机械化普及率的因素主要有村组内是否有集体互助行为和上一年村组农业生产总值。通常而言,集体互助合作较好的村组,拥有机械的农机手更愿意彼此互帮互助,在村组内部和外部间都有利于降低村落保护主义,从而提升机械的使用效率。然而,实证结果显示村组内是否有集体互助行为在 1% 和 10% 的显著水平分别正向影响农用机械普及率和农机总动力的提升。这与假说 2 有点不相符。在实地调查中,虽然当地村组互助合作相对较好,但可能受到当地政府农机购置补助和加入农机专业合作社能获取低息贷款的优惠激励,使得农户更愿意去购置农用机械,从而整体提升了农用机械的普及率和农机总动力。上一年村组农业生产总值对农业机械化普及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农业的机械化程度也会不断地发生诱致性变迁。

表 1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各指标的影响因素分析

解释变量	农地流转率相对当地平均水平(高 =1,低 =0)	机械化普及率相对当地平均水平(高 =1,低 =0)	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相对当地平均水平(高 =1,低 =0)	合作化率相对当地平均水平(高 =1,低 =0)	信息化率相对当地平均水平(高 =1,低 =0)
家户制变量					
是否租入其他村庄农地(1 = 是,0 = 否)	—	0.027	0.041	0.039	0.069
		(1.031)	(1.219)	(1.421)	(1.367)
其他村庄人员落户本村是否困	0.005	0.041	0.029 **	0.033	0.059
难(1 = 是,0 = 否)	(0.842)	(1.022)	(1.131)	(1.643)	(1.405)
村庄内部是否存在亲缘关系	0.021 ***	0.061	0.034	0.057 **	0.039 *
(1 = 是,0 = 否)	(1.431)	(0.954)	(1.051)	(0.689)	(1.326)
是否有宗族信仰(1 = 是,0 = 否)	0.035	0.034	0.037	0.049	0.092
	(0.321)	(0.549)	(0.059)	(0.899)	(2.038)
村落保护主义变量					
村组内是否有集体互助行为	0.065	−0.072 ***	0.049 *	0.064	0.099
(1 = 是,0 = 否)	(1.621)	(0.345)	(0.728)	(0.828)	(1.527)
村组间是否会有保护主义现象	−0.041 **	0.026 *	0.034	−0.025	0.037
(1 = 是,0 = 否)	(0.269)	(0.736)	(0.798)	(0.773)	(0.809)
外地机械进入本村组耕种是否	0.036		0.063 **	0.084	0.092
有抵制心态(1 = 是,0 = 否)	(0.951)	—	(0.915)	(1.021)	(1.352)
外地户口是否容易租入农地	−0.068 **	0.072	0.087	0.067	0.067
(1 = 是,0 = 否)	(0.826)	(0.992)	(0.912)	(0.842)	(0.851)
社会经济变量					
上一年非农人口数(取对数)	0.054	0.069	0.043	0.033	0.057
	(0.527)	(0.678)	(1.025)	(1.467)	(1.204)
上一年村组农业生产总值(取对数)	0.036	0.048 **	0.715 ***	0.061	0.039
	(1.131)	(1.034)	(0.489)	(0.895)	(0.761)
上一年非农户口比例	0.097 ***	0.082	1.021 **	0.103 **	0.077
	(1.125)	(0.951)	(0.398)	(0.462)	(0.567)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值;***、**、*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水平。

影响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的因素主要有其他村庄人员落户本村是否困难、外地机械进入本村组耕种是否有抵制心态、上一年村组农业生产总值以及上一年非农户口比例。其他村庄人员落户本村是否困难这一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正向影响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其原因为若村组内部农户存在较大的排外心理，抵制情绪使得当农业生产实际农业劳动力不足时，机械替代劳动的需求增多，进而导致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提升。外地机械进入本村组耕种是否有抵制心态在5%的显著水平正向影响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的提升，可能原因为农户在农业生产环节的外包上，由于村落保护主义的存在，大多农户会选择本村组人员进行农业生产服务，而一旦出现农忙季节，本村组现有机械有可能相对紧张，而且农户之间往往希望农忙期间机耕、插秧、收割等各农业生产环节越早结束越好，使得越到农忙机械手越紧俏。然而，如果本村组无机械农户邀请外地机械手帮忙机耕，有可能来年会受到本村机械手的冷落，再请本村机械手机耕时就比较麻烦，因此，这种村落保护主义不利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等社会化服务水平的协同。很多农户为图方便大多自行购买小型农用机械，虽然这种行为不经济，但已成当地常态。此外，非农户口比例的提升也显著提高机械总动力水平，机械替代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提升了农业机械总动力水平。

影响合作化率的因素主要有村庄内部是否存在亲缘关系和上一年非农户口比例。在家户制变量中，村庄内部存在亲缘关系在5%的显著水平对合作化率产生积极影响，这一实证结果与假说3刚好相反。虽然村庄内部人员存在亲缘关系能够较好地互帮互助，由此可能导致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不强，但农户之间往往存在跟随心理，有些农户加入合作社后在农业贷款、机械化耕种等方面有较大的实惠，同时当地政府也会对合作社提供一定的政策扶持，激发了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因此，家户制对农业现代化进程的规模化经营与合作化率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非农户口比例的提升在5%的显著水平正向影响合作化率，非农就业人口的增加使得空置农地增多，农地流转和生产环节外包情况普遍增加，农户之间市场化的互助合作行为增多。此外，家户制变量、村落保护主义变量以及社会经济变量对农业信息化率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说4的观点，说明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家户制和村落保护主义对农户获取农业信息方面的影响较为有限，农民接收农业信息的渠道和方式更为多元化。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江西省万安县黄南村的一个个案，从家户制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影响农业现代化发展各项指标的一些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村庄内部亲缘关系越紧密、村组间保护主义越弱、外地户口租入农地越难以及上一年非农户口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农地流转率的提高；村组内集体互助合作越差和上一年村组农业生产总值越高，越有利于机械化普及率的提高；其他村庄人员落户本村越困难、本村农户对外地机械进入本村组耕种越抵制、上一年村组农业生产总值越高以及上一年非农户口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农用机械总动力的提升；村庄内部亲缘关系越紧密和上一年非农户口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合作化率的提高。此外，家户制变量、村落保护主义变量以及社会经济变量对农业信息化率的提高没有显著性影响。因此，如何从家户制的传统中汲取精华，不断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家户制的一次回归，对农业的生产和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经验启示我们，一是政府应该通过汲取家户制的精华，进一步强化农户农地家庭承包的权能，明晰农地的各项权能并予以规范，为农地的合理流转提

供制度保障;二是可以沿袭农地的永佃制传统,允许农地像物权财产一样可以继承,增强地权的稳定性和安全性[19],从而增强农户的流转意愿;三是借鉴家庭农场模式的成功经验,处理好对土地的"统"和"分",同时引入农地流转的中介平台[20],推动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村落保护主义的存在对中国构建以市场经济为主的要素分配机制具有不利影响,为了降低这种村落保护主义对农业现代化的阻碍作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引入竞争机制和农业人口的非农转移。一是在农业生产环节的外包方面,引入跨区作业机械的进入打破村落垄断,颁发跨区作业机械通行证和实行跨区作业机械补贴政策,如开通机械燃油绿色通道、高速过往绿色通道等,从而加强市场的竞争程度;二是政府应加强招商引资提供非农就业岗位以方便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三是打破户籍制度的藩篱,让农村户口与非农户口适度的流动,降低一个村庄或一个村庄宗亲关系的密度,避免因村落保护主义的力量过大而阻碍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家户制最主要是透过亲缘关系联系起来,在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时代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加强农村合作化率和组织化水平方面,可以汲取家户制的精华以配合农业产业化、组织化和规模化发展的需要。比如采取"公司 + 农户 + 基地""农户 + 公司与农户合股 + 职业农民""农户 + 合作社 + 公司"等模式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此外,可以继续发扬家户制中"你帮我、我帮你"的传统精神,强化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从而提升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率。

参考文献:

[1]徐　勇. 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J]. 中国社会科学,2013,(8):102 - 123.

[2]徐　勇. 东方自由主义的发掘——兼评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J]. 学术月刊,2012,(4):5 - 18.

[3]LOKSHIN M,RAVALLION M. Household Income Dynamics in Two Transition Economics[J]. Studies in Nonlinear Dynamics & Econometrics,2004,8(3):631 - 649.

[4]ZHANG Y,WAN G 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2006,11(2):196 - 212.

[5]GERRY C,LI C. Consumption Smoothing and Vulnerability in Russia[J].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2009,12(5):57 - 68.

[6]IVANIC S,MARTIN L,ZAMAN C. Estimating the Short-Run Poverty Impacts of the 2010 - 2011 Surge in Food Price[J].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11,(11):1134 - 1141.

[7]SURYAHADI C,SUMARTO M. The Chronic Poor, the Transient Poor and the Vulnerable in Indonesia Before and After the Crisis[J].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1,(2):203 - 212.

[8]梅方权. 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1,(12):22 - 26.

[9]咸春龙. 论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民组织化问题[J]. 农业经济问题,2002,(2):40 - 43.

[10]薛琳琳. 对农户经济的突破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J]. 生产力研究,2005,(6):43 - 44.

[11]张　良. 实体性、规范性、信仰性:农村文化的三维性分析——基于湖北、安徽两省八县(区)的实证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2010,(2):87 - 96.

[12]詹成付,刘义强,胡　军. 重塑村庄治理基础的村户联结机制——以湖北省平原村村级产业发展为例[J]. 社会主义研究,2013,(12):86 - 93.

[13]陶自祥. 分裂与继替:农村家庭延续机制的研究——兼论农村家庭的区域类型[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2013.

[14]姬会然. 20 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的变奏与调谐——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梳理[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7):69 - 76.
[15]潘锦云,杨国才,汪时珍. 引植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制度安排与路径选择——基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技术视角[J]. 经济体制改革,2013,(1):74 - 78.
[16]申 云,曹跃群,彭小兵. 城镇化区域外溢与区域经济增长趋同——基于成渝经济区的经验证据[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5):19 - 29.
[17]屈学书.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问题研究[D]. 太原: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4.
[18]王志刚,申红芳,廖西元. 农业规模经营:从生产环节外包开始——以水稻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2011,(9):4 - 12.
[19]胡冬生,余秀江,王宣喻. 农业产业化路径选择:农地入股流转、发展股份合作经济——以广东梅州长教村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2010,(3):47 - 59.
[20]朱述斌,申 云,石成玉. 农地流转市场中介平台与定价机制研究——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视角[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11,(3):108 - 112.

Household System, Village Protectionism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HEN Yun[1], ZHU Shu-bin[2]

(1. *Faculty of Arts & Humaniti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2. *The New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5, *China*)

Abstract: The factors such as Household System and village protectionism would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loser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village, the weaker village protectionism, the more difficult for non-local farmers to rent farmland and that a higher proportion of annual non-agricultural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ts is conducive to the circul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It also shows that the consanguinity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village and a higher gros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past year are beneficial to the mechanization rate. The difficulty for migrants from other villages to settle in, and the resistance from the farmers to the farming machinery of the other village, are helpful to the total pow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 higher gros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 higher proportion of annual non-agricultural residence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the total pow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losely genetic relationship among the villagers, a higher proportion of annual non-agricultural residence ,is helpful to the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the Household System , the village protectionism, and the social economy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Key Words: Household System; village protectionism;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gricultural economy